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



【日】佐藤公彦 著 宋军 彭曦 何慈毅 译

义和团的起源及其运动

義和團の起源
とその運動

【日】佐藤公彦 著 宋军 彭曦 何慈毅 译

义和团的起源及其运动

——中国民众 Nationalism 的诞生——

義和團の起源
とその運動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字:01-2007-134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义和团的起源及其运动:中国民众 Nationalism 的诞生/(日)佐藤公彦著;宋军等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4

ISBN 978-7-5004-5996-5

I. 义… II. ①佐…②宋… III. 义和团运动—研究
IV. K256.7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23856号

義和団の起源とその運動——中国民衆ナショナリズムの誕生
1999年 研文出版(東京、日本)

Translated from the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in 1999 by Kembunshuppan, Tokyo, Japan.

策划编辑 郭沂纹
责任编辑 易小放
责任校对 徐幼玲
封面设计 毛国宣
版式设计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丰华装订厂

版 次 2007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07年4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90×1240 1/32

印 张 25.875

插 页 3

字 数 669千字

定 价 55.00元

“编译丛刊”编委会

主 编 于 沛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美]孔飞力 王大庆 王 江 王晓秋

[法]巴斯蒂夫人 [德]达素彬

[俄]米亚斯尼科夫 朱政惠 刘 东

张西平 [英]吴方思 杨念群 赵世瑜

耿 昇 徐 浩 徐思彦 钱乘旦

虞和平 戴 寅

装帧设计 陆智昌

本刊常设机构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组

本刊负责人 徐 浩

电话:(010)62586139

电子邮件:bianyicongkan@126.com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苏州街16号神州数码

大厦1318房间

邮政编码:100080

“编译丛刊”已出版书目

1. [葡] 安文思著，何高济、李申译：《中国新史》
2. [法] 李明著，郭强等译：《中国近事报道》
3. [美] 梅尔清著，朱修春译：《清初扬州文化》
4. 倪瑞英译，刘海岩校：《八国联军占领实录：天津临时政府会议纪要》（上、下册）
5. [美] 曾小萍著，董建中译：《州县官的银两——18世纪中国的合理化财政改革》
6. [德] 余凯思著，孙立新译，刘新利校：《在“模范殖民地”胶州湾的统治与抵抗》
7. [英] 赫德著，叶凤美译：《这些从秦国来——中国问题论集》
8. [英] 李提摩太著，李宪堂译：《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
9. [美] 罗威廉著，江溶、鲁西奇译，彭雨新、鲁西奇校：《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
10. [美] 魏若望著，吴莉苇译：《耶稣会士傅圣泽神甫传：索隐派思想在中国及欧洲》
11. [英] 杜格尔德·克里斯蒂著，[英] 伊泽·英格利斯编，张士尊、信丹娜译：《奉天三十年（1883—1913）杜格尔德·克里斯蒂的经历与回忆》
12. [日] 安冈昭男著，胡连成译，王晓秋审校：《明治前期中日关系史研究》
13. [日] 佐藤公彦著，宋军、彭曦、何慈毅译：《义和团的起源及其运动——中国民众 Nationalism 的诞生》

总 序

纂修清史是我国新世纪标志性的文化工程，它包括 3000 余万字的清史主体工程及文献、档案整理和编译工作。广大史学工作者正以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努力做好清史编纂工作，科学总结历史经验，继承和弘扬民族文化，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

世界各国从分散发展到趋于一体，大抵从 15 世纪、16 世纪开始，直至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形成了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和世界体系。清朝从 1644 年到 1912 年共延续了 268 年，这是世界历史发生深刻变化的重要的转折时期。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清王朝却依然以“天朝大国”自居，闭关自守，使封建社会的中国越来越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洋枪洋炮面前不堪一击；西方列强用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使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在 18 世纪世界历史的大变局中，康乾盛世不过是中国封建社会“落日的辉煌”，而到 19 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后，清朝日益衰颓，已奏起了“落日的挽歌”。因此，研究清史，确定它的基本内容，以及确定研究它的基本理论、原则和方法时，不能脱离清王朝社会发展过程中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

在编纂清史时要有世界眼光，这已是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共识。不仅要把清史放到世界历史的范畴中去分析、研究和评价，既要着眼中国历史的发展，又要联系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而且还要放眼

世界，博采众长，搜集和积累世界各国人士关于清代中国的大量记载，汲取外国清史研究的有益成果，为我所用。正是从这一基本认识出发，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决定编辑出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以下简称“编译丛刊”）。

清朝建立之初，曾和世界各国保持一定程度上的接触。后来中国的大门一度被关闭而后又被强行打开，这期间，外国的传教士、商人、外交官、军队、探险家、科学考察队蜂拥而来，东方古国的一切都使他们感到惊奇。基于种种不同的目的，他们记录下在华的所见所闻。这些记录数量浩瀚，积存在世界各国的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或私人手中，成为了解清代近三个世纪历史的珍贵资料。由于西方人士观察、思考和写作习惯与中国人不同，他们的记载比较具体、广泛，比较注重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方面，因而补充了中国史料记载的不足。“编译丛刊”将从中选取若干重要资料译介给国内的读者；对早年问世的具有开拓性、奠基性价值，但不为中国学术界所熟知的作品，我们也将同样给予关注；此外，对反映当代国外清史研究新的学术思潮、前沿问题、热点问题和重要成果的学术专著，“编译丛刊”也将及时地介绍给中国学术界。

从中国史学的历史与现实出发，有选择地介绍国外新史学的一些理论与方法是必要的。如西方历史学家提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史学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了”，主要是强调扩大历史学家的视野，拓宽历史研究的选题；又如提倡“自下而上看的历史学”，努力将社会精英的历史变成社会大众的历史，将千百年来隐藏在历史幕后的社会大众推上历史的前台。此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史研究整体化趋势的推动下，出现了一系列历史学分支学科，如社会史、人口史、民俗史、新经济史、新政治史、心理史、社会生态史、环境史、妇女史、城市史、家庭史等等，对于纂修清史有一定的借鉴作用，这些都将在“编译丛刊”的作品中有所体现。

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一部不同文明间不断交流和融合的历史。任何国家的文化都是通过与异质文化的对话和交流获得营养，从而不断发展壮大。纂修清史必须排除闭关自守的文化排外主义的干扰，破除中西对立的僵化思维方式，以开放的胸襟、兼容的态度和科学的精神对待国外清史研究的一切成果，因为它们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愿“编译丛刊”在新世纪中外文化交流的广阔背景下，作为一座科学的桥梁、友谊的桥梁，为纂修清史做出更多的贡献。

于 沛

2004年5月

中文版前言

在中国近代史上，恐怕没有如义和团事件这般毁誉褒贬激烈、评价不一、常陷论争、引发问题的历史事件。自1980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之后，诸多学者致力于调查、研究、刊行资料集，就历史事实搭建起共识性平台，这意味着事实认定方面的差异减少了。然而，如何诠释历史事实，至今在世界范围内仍无定论。其根本在于Nationalism问题，因为义和团事件本身具有世界历史性意义，它尖锐地触及到如何把握近代世界的国民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问题。仅限于冷战结束后而言，苏联解体使世界迎来“历史的终结”、今后世界将趋于全球化、普及美国式民主政治及自由主义经济——此类言说与幻想甚嚣尘上。但苏联解体与政治经济的全球化在世界各地却引发了深刻的国家分裂、民族对立、纷争与战争。于是，为了维持世界秩序，在制裁镇压这类纷争时所惯常使用的词句就是“反文明罪”、“反人道罪”。每次听到这样的词句，笔者就会想起上一世纪初针对义和团事件列国全权联名公告中的定罪词句：“反国际法则、反人道且反文明之罪恶”。这些词句也被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军事法庭所使用，成为战后国际法的语境，尤其在苏联解体后更被广泛言说，这只能说明义和团事件至今仍与世界现实密切相关，此现实世界的分裂带给对事件的历史诠释以巨大的分歧。中国与西方、基督徒与非基督徒、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新时代与旧时代、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宗教学者与政治学者关于义

和团事件的诠释的对立分化难以调和，因为中国人和身处基督教文明的欧美人根本不可能抛开各自的文化、情感来言说及撰写事件的历史，只要历史记述是根植于“现在”的，上述分歧就是不可避免的。

在这一点上，笔者作为非基督教国家的历史研究者，所处位置可以比较冷静、客观地看待中国与西方之间可谓惊天动地的冲突（包括中国宗教与基督教的冲突）。如果历史学家对历史不予评价，即等于放弃责任与义务，但日本近代实证主义式的史学传统不喜欢正面提出评价，笔者也身处该文化之中，故较之评价更关注意义，致力于究明历史意义。具体言之，就是探明义和团运动对于近代中国国家及近代中国形成的根基——Nationalism 运动有着什么样的意义，并厘清其思想与行动的历史与结构。此外还有一点是重要的，即作为历史研究，需将围绕着义和团事件的义和团大众、外国宣教士、中国官僚及政治当权者各自的社会性、政治性行为视为可“理解”的人类行为，故不可缺失社会结构与文化（政治文化、宗教文化、心性研究）视角，为此，笔者采用了尽可能详细微观地考察中国社会底层大众行为的方法，即所谓“社会显微镜”（micro-history）的接近法（approach），这有赖于中国友人和笔者历时五年的农村调查体验。进而又意识到那些行为还受到更大的内政外交框架的限定，因此必然扩展至整体史的宏观范畴。笔者的整体史叙述视角与英国学者彼得·伯克的《历史学与社会理论》（Polity, London, 1992. 中文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所言多有相合之处，甚愿读者参阅该书。

值此中文版问世之际，基于原著出版后的若干情形，特作如下几点补充：

第一，关于本书第一章所述、亦即书名《义和团的起源及其运动》所示之源流论、起源论。笔者的基本见解起步于 1980 年国

际研讨会提交的《〈义和团源流〉考——义和拳·八卦教》（《义和团运动史讨论文集》，齐鲁书社1982年版），此后又使用研讨会上公开的史料撰写并发表了《义和团（拳）源流》（《史学杂志》1982年第1期，东京大学史学会）。美国学者周锡瑞（J. Esherick）先生于1987年在其著作中将笔者的见解斥为错误，并提出自己的观点，该书已有日文版（1994年）和中文版（1994年）。于是，笔者在《史学杂志》（1995年第1期）发表文章予以反驳，对周先生的批判进行反批判，进而在本书日文原著（1999年）中作了更为详尽的论述，展开了与周先生的论战并声明等候其回应。然而时至今日已十年有余，仍未见周先生有所反馈，有鉴于此，笔者不得不作出判断，即周锡瑞先生本人已承认自己的学说不能成立。基于这一判断，笔者特此声明终止这场论战。

义和拳的起源之一即鲁西南大刀会武术金钟罩及其组织，现举一原书未曾使用之颇为有趣的史料，因属首次披露，或可供学界参考。据《益闻录》光绪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九日（1896年4月11日）1562号所记：

“当面破法”。山东人某甲习成邪术，能使枪刀不入、水火不伤，名为大刀会，又名金龙罩。如有人放枪，甲能使之噎，药燃不发。近日行至徐州府城，侨寓一椽藉以鹤寄，开门授徒，招人习其邪法。凡欲投拜为师者，须青蚨三千文，作为贖币。画符念咒喃喃有词，且自炫其长，向人夸耀大言不惭，几等铜皮铁骨，盖世英雄。适有路过某乙，见而不平，向甲曰：我今有手枪在此，倘君果能使不响，愿拜门下。甲应声曰：诺，可当面试验，速行放枪。乙见甲脱衣赤膊，挺胸而立，口内念咒，乃扳揆关，雷声动，向甲顶上吱然飞越。甲惊吓异常，面如土色。乙曰：汝不噤枪，安用狂妄在此惑众。甲赧颜婉谢，谓学术未精，今当回去。爰收拾残场而走。人皆拍掌称快。

第二，关于明恩溥（A. Smith）的义和团团练起源说。无论从何种史料实证作业中均无从得出这样的结论，因此只能说这是他为保护己方教会并使其所邀美国政府的军事外交介入正当化而作出的巧妙托词罢了。该观点又为施达格（G. N. Steiger，美国人）所继承，他在处于国民革命时期反帝浪潮中的上海再次提出了团练起源说。本书日文原著已对这种观点的托词性作出明晰的剖析，随后稍作研究，进而发现英美基督教在华宣教士为自身宣教活动寻求保护，认为有必要要求该国政府政治介入，志在击溃妨碍宣教的清朝官僚，处分一些高官，以收杀一儆百之效，甚至主张必要时借助炮舰外交、军事介入施压，是从中日战争后 1895 年的成都教案、古田教案（英国公使欧格讷、美国公使田贝）开始的。通过对战败创伤未愈、积弱不堪的总理衙门施加高压外交手段，产生了事件发生地的总督巡抚遭罢免、由当地支付赔款、停止科举等教案处理方法，此办法为以后处理巨野事件所承袭，并写入《北京议定书》中。这两起教案成为日后美国“攻击性爱国主义”的起点。在扩张主义色彩最为浓厚的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和驻华公使康格时期，美国基督教宣教士们以有助于宣教为由赞成征服菲律宾作为殖民地，而其在华宣教士则期待美国的宣教外交以强硬的姿态面对中国。事实上，康格正是接受了明恩溥等人的请求才施压使山东巡抚毓贤被调离的，而明恩溥的论点则与上述美国宣教士的动向密切关联，其托词是妨碍宣教、通商全面开放的官僚即为障碍，义和拳的反教会活动受到官方的许可、庇护并以团练的形式兴起，若不积极击溃这些官员，就无法实现基督教对中国的改革，故军事外交压力是必要的。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此后美国人有关义和团的观点，均未能超越诸如文明化使命、以基督教改良中国、以世界美国化为使命的新教式思考模式。

第三，关于义和拳向义和团转化始于何日的问题。中文版认为

进攻天津租界是在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1900年6月17日），作为回击列国海军攻击大沽炮台而进攻租界。当日清晨，已过了最后通牒所言时刻，直隶总督裕禄才接到各国领事通知他在期限内交出炮台的最后通牒，故而甚为愤怒，将天津军械所的武器发放给请求援助进攻租界的义和拳，这标志着义和拳被正式认可，形成了针对外国租界的官方与义和拳（团）的共同战线。日文原著所言前一日即二十日（16日），现因《京津拳匪纪略》所言之二十一日（17日）能够合理地说明裕禄的行动与事态的展开，故予以修正。

第四，关于事件的善后处理。事件在平息后一直被称做“义和团之乱”（Boxer Rebellion），日本的历史教科书亦作如是记载，笔者所学的也是如此，近年来的一些言说仍为“义和团之乱”，很少有人会认真地质疑以“扶清灭洋”即拥护国家、排斥外国为口号的大众运动，为何被视为“叛乱”（rebellion）即对国家及国家权力的叛逆呢？这在逻辑上难道不矛盾吗？近来英语圈也开始使用Boxer Uprising、Boxer Movement这类用语，笔者甚愿欧美人能明确说明这一历史意识的变化。其乃基于一种虚构的逻辑而组成——即该事件是由与清国及西太后无关的“拳匪”即义和团所引发的叛乱，列国来华是为了帮助受害的清国讨伐叛乱分子即“拳匪”的，这一处理方法对列国与清朝国家及其当权者西太后双方都是有益的（参照本书结章注②）。这使笔者联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后处理（远东军事法庭即东京法庭），联合国并未追究日本天皇的战争责任，这与义和团事件后没有追究西太后的战争责任何其相似。笔者在日本国内曾数次言及于此，但应者寥寥。后来当笔者读到唐德刚先生《晚清七十年·四·义和团与八国联军》（台北，远流出版，1998年）所言相同之处（第97页）时，便重新坚信这观点没有错。“叛乱”（rebellion）这一历史用语深受列国及李鸿章为处理战后事宜而持有的虚伪认识所污染，这种事例恐怕在世界历史上并

非“义和团事件”所仅有。

此外，义和团事件时清王朝政治与中国以后发生的一些政治事件颇为类似，此观点于1980年由王致中氏提出，本书日文版也多次论及，且与唐德刚先生有共鸣。但在出版中文版时原著的这些内容均作省略，敬请读者参照唐德刚先生著作与本书日文原著。

中文版的问世是件喜事，拙著因此超越了日语这一狭窄的语言空间，使全世界研究中国的学者得以阅读，不论对笔者的研究表示支持还是批评，它终归来到了世界学术研究共同的平台上。相信本书对实证性历史事实的确定及其历史意义的探明必会有所裨益，深望它能为研究的进深发挥作用并得到指正。在此，笔者要对宋军博士表示衷心感谢，他在旷日持久的翻译工作中付出许多辛劳和忍耐。

在翻译过程中，本书所用之“义和团事件”这一术语稍显费解，现予以简要说明。在中国，从大众民族主义运动的国家历史（National history）角度出发，表述为“义和团运动”，而在与外国列强相关的军事外交层面则使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一词，二者有别。从各国角度来看，义和团首先是一国际“事件”，分别表述为“叛乱”（Rebellion）、“惨祸”（Catastrophe）、“暴动”（Uprising）、“运动”（Movement）及以军事层面为主的“事变”等。这样，国内与国际、中国与外国、大众运动与战争外交等，因书写视角定位相异而使用不同的术语。然而“运动”一词使国际关系、外交、国内政治动向、军事战争、议定书（Protocol）退居背景地位；而“事变”、“战争”则单方面突出军事却欠缺大众运动侧面。作为包括国际关系、大众（Nationalism）运动、政治、外交、军事战争、宗教文化冲突在内的世界史整体维度的概念，笔者的判断是使用中立的“义和团事件”最佳，本书即是在此意义上使用该术语的，是与1900年当时所盛言之“事件”含义不同的历史词汇，使用方法也不相同。附带提一句，该术语、称谓的应用在日本甚为

普遍。

1999年，原书由日本研文出版社付梓出版后，笔者获得母校一桥大学所授予的博士学位。2002年3月，笔者到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北京外国语大学内）任日方主任教授，为期一年。在柳絮飞舞的季节，与宋军先生重温旧谊，先生提出希望能翻译拙著，笔者欣然同意。此后不久，因路遥先生（山东大学）来到北京，笔者与程歆先生（中国人民大学）、阮芳纪先生（原《历史研究》副主编）等老友欢聚畅谈，席间，他们也一致推举宋军先生翻译拙著。老友们的提议使本书中文版开始起步。当年，阮芳纪先生即联系并落实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春回国后，笔者便开始着手以欠缺的汉语能力修改宋军先生寄来的中文稿件，其中部分翻译工作拜托南京大学的彭曦先生（东京外国语大学博士）和何慈毅先生承担。于是，笔者得以再次通读全书，订正了原书中史料引用方面的若干失误，并充实了几处论述不太完全的地方，寄还的全部中文译稿再烦劳宋先生统稿。最后，承蒙中国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将本书中译本收入《编译丛刊》，为其出版提供了保障。距本书中文版的最终问世或许尚需时日，每当笔者想到这些老友的情谊与支持，便深觉感激。

中文版自有其“命运”，这已超越著者自己的想象。

2006年5月27日 于东京·府中市·东京外国语大学

日文版序

本书是笔者近八年来有关义和团的研究成果、1980年前后撰写的论文以及此番新作的集成。

笔者在大学任教之后，自1986年年末开始有幸连续五年多获得机会与日中两国的学者（由佐佐木卫、路遥两位先生任团长）对义和团曾经活动过的九个村庄进行调查，得以在酷寒中到当地听取农民的讲述，从而对该地区农村和生长在其中的人们的生活有了几分实际感受。同时，也从不同层面对华北农村社会的特质以及民众运动进行思考。这些经历和对调查的整理，促成笔者恢复了中断一时的义和团研究。

本书的特色在于，通过对农村调查结果及汗牛充栋的文献史料的分析，对长期流行于清代山东的“义和拳”这一具有宗教色彩的武术，从其起源到清末义和拳运动的产生和扩大、列强出兵、清朝的宣战与败北、民众运动最终向“扫清灭洋”转变这一历史全过程进行微观分析，并将其与当时的国际关系、中央政治动向的宏观分析相整合，从而勾勒出一个整体框架，明确了其间的相互关联，以首尾相贯的理论对运动的起源和事件的展开进行说明，力图使全书具有一定的可读性。

迄今为止，义和团研究因该事件是针对基督教发生的，所以从一开始就引起欧美研究者的关注，他们的着眼点主要在于“西洋与中国”关系史（外交、军事史）以及基督教受难史。为这一定

式带来改变的是周锡瑞 (J. W. Esherick) 的《义和团运动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Boxer Uprising*, California U. P. 1987)。周锡瑞在中国作研究期间进行了田野调查并收集史料, 该书试图从中国视角把握义和团, 因此在欧美学术研究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从而获得了费正清奖和勒文森中国研究书籍奖。然而, 周锡瑞的著作几乎完全照搬了山东大学以山东西南、西北和直隶山东交界三个地区为义和团调查的重点这一框架, 同样认为运动是在这三个区域发展起来的。此外, 该书也未能解明戊戌政变、沂州教案、德军侵入内地给运动带来的冲击及其意义。在运动的起源等方面, 仍存在着诸多问题 (本书将对此进行详细的批判)。总之, 该书在从义和团的起源到战争的连贯性说明、对运动及事件的历史性定位及其意义的把握方面都称不上成功。

为了从整体上把握该运动, 除了对义和团的起源进行探究之外, 还有必要对华北农村社会的构造及其文化、基督教在中国的宣教史、中国宗教论、清代民间宗教史、民众运动史、Nationalism、清末政治史、外交和国际关系史等进行多方面的考察。可以说, 本书是唯一综合上述各部分内容叙述整体历史的一部论著。因此, 实际上本书已超越了所谓民众史、民众运动史的框架, 在写作中添加了围绕着戊戌变法、政变及宣战展开的清朝中央的政治史、人事变动、列强的远东外交等新见解, 并且还涉及了诸如华北农村社会论、明清时期基督教宣教史及其存在的问题、中国的法与审判、中国民间宗教与武术以及辛亥革命的新观点等自成一体的研究领域。在此意义上, 这是一部“整体历史”。

构成本书基础的农村调查, 不仅是我们的成果, 还包括 20 世纪 60 年代山东大学进行的调查、南开大学的天津调查、路遥等人的威县调查以及以各县文化馆为主进行的调查。当然, 这一系列的调查记录作为口述历史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误传, 笔者在行文中尽量参见文献史料去伪存真。在文献史料方面, 有许多属本书首次使